

2017年5月31日的“关注如东”微信公众平台发布了一条“小洋口惊现海市蜃楼奇观!!”的新闻:5月30日下午,一群正在小洋口滩涂拍摄海边落日的摄影爱好者无意中发现面前茫茫大海的海面上突然出现许多楼房,隐隐约约,但不是十分清晰,大家判定这就是海市蜃楼,于是各人赶快选择角度进行拍摄,可是换了个位置,同样的场景,反倒看不太清楚。海市蜃楼的景象持续了大约3分钟,随着太阳落山才渐渐消退。仔细从照片上看,似乎还有林立的电线杆。

其实,这不是如东第一次出现海市蜃楼的奇观。原东凌文化站长姚和先生多年前就曾告诉笔者:有一次,他曾经在东凌海堤上看到过东方海天间隐隐约有楼房林立、车水马龙的景象,持续十分钟的样子;他在年轻时,下小海也曾看见过一次海市蜃楼的奇景。由于过去渔民没有文化,不知道这是地球上物体反射的光经大气折射而形成的虚像,迷信地认为这是海龙王“现殿”。姚和先生也曾早就听当地渔民说过海上“现殿”之事,由于过去人们没有拍摄设备,因此外界更无从得知。同在南黄海之滨的阜宁县,当地渔民将海市蜃楼称之为“现殿”、“现庄”。

在陈允豪、钱瓔、钱小惠编的《钱毅的书》中的《海洋神话与传说》一章中,在叙述阜宁沿海民间的各种神话传说的同时,钱毅还进行了科学的解释。在“现殿 现庄——海市蜃楼”一节中,除介绍光绪《阜宁县志》关于同治三年七月出现“现殿”的记载,还详细记述了作者在1943年11月12日亲眼目睹阜宁海边海市蜃楼的情景。

顺便说一下钱毅。钱毅(1925—1947),抗战初期在上海读中学时就参加抗日活动。1941年,16岁的钱毅和姐姐、弟弟、妹妹四人随父亲阿英(原名钱杏邨,著名文学家、剧作家,1926年入党)来到苏北抗日根据地参加了新四军。1944年调到《盐阜大众》任编辑、副总编。1947年调任新华社盐阜分社和《盐阜日报》社特派记者。1947年2月,钱毅在淮安石塘区采访,被还乡团发现,在突围中牺牲。生前著有《庄稼话》、《大众诗歌》等,陈毅同志知道钱毅牺牲的消息后,心情十分悲痛,曾经对阿英同志说:“死的很可

编者按 吴剑坤先生在“现殿——南黄海的海市蜃楼”一文中提及凡一同志,为增加读者对如东已故乡贤凡一同志的了解,特将其友、著名作家陆文夫的“一滴何曾到九泉——悼凡一同志”一文随同刊发,以供一阅。

钩沉

一滴何曾到九泉

——悼凡一同志

□ 陆文夫

辑佚

“现殿”,南黄海的海市蜃楼

□ 吴剑坤



惜,你要好好地收集他的遗文,替他编个集子纪念他。”在钱毅的战友陈允豪、姐姐钱瓔、弟弟钱小惠共同努力下,《钱毅的书》于1979年出版。在《编辑记者一百人》(学林出版社1985)一书中,有一篇钱毅的姐夫、如东人凡一写的题为《优秀的大众新闻工作者钱毅》的文章,该文说,著名的作家“陈登科同志初到《盐阜大众》担任工农记者,领导上要钱毅同志帮助培养……他从来不以培养者自居;而是虚心地向陈登科同志学习。”

在历史上,亦曾经有两次关于如东海上“现殿”的文字记载。清道光年间,通州骑岸的秀才曹长恩写过一本《东洲偶闻录》,在该书的第十六章《归里 海市》里记载有海门岛的形状、位置及其俗称:“岛居东海中,其形如伞,如菌蕈,流人称之为菌子洲。菌柄对陆地,菌伞对大海。柄长十四、五里,宽三、四里;伞最宽处八十余里。渐向外伸展,紧缩一穹窿云。”如东县小洋口附近的海门岛出现过虚幻奇妙的海市蜃楼,《东洲偶闻录》中记载了这一传说:东方微白,海市隐现。只见天水相连处涌出一岛,向陆狭长,而向海宽阔。岛上宫庙民居,清晰可辨;潮墩盐灶,历历在目;人群熙来攘往,络绎不绝;牛车愚愚,杂乎其间;肥马嘶鸣,奔驰道上。视力好的人甚至能看到煮盐灶火在熊熊燃烧。大约持续一顿饭的工夫,一轮红日跃出海面,岛屿顿成子虚乌有,只余下海天一色映照着朝霞。对此,《东洲偶闻录》在写到“海市呈岛屿如海门岛凡三次”时指出“两次在此间,一次在北十余里之黄沙洋口”,“此间”按《东洲偶闻录》所指的线索,当在掘港附近的海域,也就是说,除黄沙洋口有一次外,掘港附近的海域曾出现过两次“现殿”奇观,不过《东洲偶闻录》中没有详细描述。

据明《筹海图编》所载之图,海门岛在丰利北面的海中,明晚期没于海。《筹海图编》系胡宗宪总督浙江军务时,为防御倭寇,聘请郑若曾等人收集海防有关资料于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编辑而成的一部沿海军事图籍。

有记载说,在乾隆年间,皋东也出现过一次海市蜃楼。该事见于清道光年间徐缙、杨廷撰同辑的《崇川咫闻录》。该书“卷十一”的“附记”载:“如皋县距海百余里,乾隆癸丑十二月二十八日薄暮,云开星灿,忽有黑气一道,从东及西,互天渐高渐远,蠕蠕而动,逾时泯灭。县中一老吏云:此海蜃吐气也。五十年前曾有之。”虽然此文所述海市蜃楼的景象不那么神奇,但因如皋海边只能在今如东海域,故从此文中可以知道,皋东海边这一次出现的海市蜃楼,时在乾隆五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即1794年1月29日。

在苏州的文化界,凡是上了一点年纪的人,很少有人不知道凡一同志。他渡江到苏州时是宣传部教科的科长,人称凡科长;后来是宣传部的部长,人称凡部长;后来是市委副书记,人称凡书记;再后来是政协副主席,人称凡主席。最后,仍称凡一同志。

其实,凡一是个文化人,多才多艺。他写文章,会画画,会制作盆景,会木工,会裁缝,是烹饪高手……每种技艺都达到一定的水平,对盆景艺术还著有论文。

在反右派之后到改革开放之前,文化人当了文化官之后往往有两种表现。一种是和原有的文化人保持一定的距离,练就一套防身术,以免那位仁兄受到整肃时会受牵连;更有甚者,到时候还可以作高水平的批判,因为文化人整文化人最为内行,也像武林高手一样,他知道你的命门在那里,只要轻轻地一点,你就动弹不得,必死无疑。

另一种文化人当了文化官之后,你不觉得他已经当了官,他还是他,和未当官时没有什么区别。凡一同志就是这样,他当了一辈子的文化官,可他不是为了保官升官而当官,是为了文化事业而当官。他不和文化人保持距离,总是把自己也放在文化人的行列里。他特别欢喜和那些学有所长,有才能的人在一起,东拉西扯,谈天说地。谁都知道,文化上的创意往往都是一时兴起,是在谈天说地中产生的。不过,这在当时很危险,因为凡是有才能的文化人都欢喜出花样,乱说乱动,死不服帖。每逢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时,这些人就不灵了,昔日座上客,今日就要入另册。

凡一同志对这些入了另册的人从不避而远之,而是照常来往,并设法帮助他们。这一点,现在的人看起来也许觉得没啥了不起,可在那时却是难能可贵了。那时,一个人如果成了什么分子,某些非常熟悉的人见了面也不点头,在马路上了便远远地避开,在小巷子里迎面碰上便把头偏在一边,好像是在查门牌似的。

我和凡一同志一起渡江到苏州,他是我的领导。我们一起在苏州渡过了这风风雨雨的五十年。我涉足文坛,写写小说。那年头,写文章好像现在的人炒股票,偶尔行情看涨,赢了一点;一会儿大盘走低,输得光光的。1957年反右派,我在南京输光了,垂头丧气地回到苏州来。凡一说,当年你到南京去我就有点不同意,如果还是在苏州的话,也许不会出事。我说那也不一定,我在苏州也是在劫难逃,你想保也保不了。他也点点头,好吧,你想当工人就安排你到工厂里去,先劳动几年再说。

我到苏州机床厂学车工去了,苦苦地劳动了两年多,表现得不错,还评了个先进生产者什么的。后来南京又要成立创作组了,为了体现出路的政策,在众多的新人之中也要有一个老的,便想到了我。南京有人来调查,苏州市委宣传部为我说好话,厂里的工人也为我说好话,二者一凑,我又到南京去当专业作家了。这一次,凡一也主张我去,说是在哪里跌倒,就要在哪里爬起来。

我在南京按着内心的伤痛,拍拍身上的灰尘,努力写好几篇小说,赢来一片赞扬,倒又像个人了。那年过春节,全家都高兴,为了犒赏我,便花四块多钱去买了一瓶茅台酒。年初二,我正喝着,凡一来拜年,门一推就闻到一股酒香,噢,你在喝茅台!我便邀他一起喝,两个人坐在一张小桌子上,喝得瓶底朝天,日子又好过起来了,痛快!

好景不长。过了两年,阶级斗争一抓又

灵了,文艺界整风,我在南京首当其冲,被批得一塌糊涂,还要把我送到劳改农场去劳改。幸亏劳改局的人高抬贵手,看了材料以后说我的条件不够,这才被永远赶出文艺界,彻底下放回苏州,到苏纶纱厂去当保全工。这时候,凡一夫妻二人已调往北京,我们已是天各一方了。

天有不测风云。凡一夫妻二人被造反派从北京押回苏州来批斗。我那时算是死老虎,虽然也要陪斗、罚跪、请罪,却没有被关起来,可以上下班或是到街上看看大字报什么的。这时候,我和凡一又见面了,那是在乐桥附近的马路上,文化系统的走资派排成长长的行列,被押着到什么地方去批斗,凡一和钱瓔也在里面。在那长长的行列里,有许多人当年是和我一起渡江过来的,在渡江行军的途中,我曾经唱过一首行军小调:“长长的行列,高唱着战歌,一步步地走着,一步步地走着……”当年,那长长的行列要跨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如今,这长长的行列又在走向何方?

我站在这行列的外面,和熟人们十分尴尬地点点头,好像是笑,也像是哭。事也凑巧,看管凡一他们的工宣队队长是从苏纶纱厂抽调去的,这位老师傅和我同在一个技术革新小组里,他问我认识不认识凡一,我说当然认识,他说凡一这人花样最多,叫他拔草,他说要有工具,要不然的话那砖头缝里的草就剔不出来。我说,那当然,凡一做事是很认真的,我来替他们做点儿工具。我在技术革新组里是造半自动落纱机的,什么材料和工具都有,立即做好几把钢皮刀由老师傅转交给凡一。我想,凡一也不是真的要想剔尽市委小花园里的杂草吧,只不过是消磨时间而已。

不久又和凡一见面了,那是在开明大戏院的后台,凡一和我们都造反派看管着,准备到時候押上台去!

这是一场苏州文化系统盛况空前的批斗大会,开明大戏院坐无虚席。主批对象是周瘦鹃,因为张春桥在上海造反派的大会上点了周瘦鹃的名,说他是鸳鸯蝴蝶派的头头,集封资修于一身等等。苏州的造反派当然不能按兵不动了,立即掀起了批斗周瘦鹃的高潮。凡一和钱瓔多年主管苏州的文化工作,是牛鬼蛇神的保护伞,是周瘦鹃家的常客,当然要陪斗。陪斗的还有程小青,同属于鸳鸯蝴蝶派,只是少了范烟桥。我因为被“武林高手”又点了一次穴,说我是新鸳鸯蝴蝶派,是周瘦鹃的徒弟,所以也恭恭敬敬。

当年的批斗大会也有程序。一般的是先唱造反派歌,籍以壮胆、提神,造气氛。然后是大喝一声:把某某押上台来!某某被两个造反派跌跌撞撞地推到台上,双手被二人向后一拉,反背在身后,然后向起一拎、弯腰,抓住头发向下一揪、低头,此种动作称之为坐喷气式飞机。

可怜的周瘦鹃那么一把年纪,一天要斗几场,已经被斗得昏昏糊糊地,不管造反派的批判发言中如何训斥、责问,他都回答:“是格,是格。”其目的是免得挨打。

我和凡一、程小青、钱瓔等人坐在后台,等待那个大喝一声,“把某某押上台来!”的时刻。押上台去当然也没有什么可怕,习惯了也就有如一场游戏,但也有感慨系之,好好的一个人,不抢不偷,怎么会被人押上台去,当众侮辱,弄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

凡一的心里当然也不好受,隔着程小青伸出手:“给我一枝烟。”

我递了一枝烟给凡一。程小青已经戒烟

了,却也要一枝。我们三个人刚抽了两口,冷不防,一个造反的小青年走上就给我一记响亮的耳光,把我咀边的香烟打飞:“你还抽烟!”

程小青连忙把烟灭掉:“小同志,不要打人嘛。”

“谁和你是同志,我还没有打你呢!”

凡一却把身子转过去,不知道是把烟藏在哪儿。

这就是我和凡一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场“后台会”,留下了一点不那么愉快的记忆。

粉碎四人帮之后我们相会的机会很多了,而且都是比较愉快的。有时候是会议上,有时候是在宴会中。我们抽烟时再也没有人来打耳光了,可我却都把烟戒了。酒不能戒,碰到一起就喝个够。每年春节,凡一家必然要打电话来,召集我们几个老人去吃一顿,十多年来从未间断过。那不是请客,而是凡一的烹饪技艺表演;那些菜也不是什么山珍海味,只是饭店里绝对做不出来,因为这菜里除掉美味之外,还调和着漫长的岁月和那深深的情谊。

国庆五十周年的时候,凡一和我们都参加了文联召开的座谈会。他很激动地谈起戏剧方面的许多问题,我却呆呆地看着这位当年的凡科长,想起了他对苏州文化事业的多方面的贡献,除掉昆曲和评弹之外,还有一点是鲜为人知的,他对苏州古典园林的修复也是功不可没。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对古典园林的修复和保护不是什么重要的课题,只是有一帮专家和学者在那里奔走呼号,提出建议,可是谁来组织他们,谁来调拨经费?凡一。凡一当时主管文化,让这些老先生都集中在文管会中,每年都为他们争取一笔经费,然后放手让专家学者们去做,凡一不加干涉。

专家们的意见也不统一,有时候会争得面红耳赤,凡一也不擅自作主,让他们自己求得统一。事实证明此种领导方法是极其高明的,苏州古典园林的修复只免受外行的干扰,才能避免那种修建中的破坏。

在庆祝建国五十周年的宴会中,我和凡一坐在一起,谈起了五十年代我们接待外宾时吃过的一些菜,老年人怀旧时总觉得现在的菜肴不如过去的好。过了没几天,凡一家突然来电话叫我去吃饭,我问他为了何事,因为春节还没有到哩。他说不为什么,就是为了吃一顿。我去一看果然如此,原来他是想证明一点:虽然风风雨雨地渡过了五十年,可他还活着,还能操办一桌和过去不相上下的菜肴。廉颇未老,尚能烹饪也。可我看见凡一那端着盆子的手在颤抖,菜的咸淡也失调,这是他过去很少有的。

凡一欢喜喝酒,也欢喜藏酒,有好酒舍不得喝,藏着。我和他正好相反,先把好的喝光。凡一虽然不赞同我的看法,可这一次却拿出一瓶五粮液来,我一喝大为赞叹,三杯下肚,又放厥词,劝他赶快把家里的好酒喝掉,免得来不及!凡一还是不同意,说是慢慢来,他要活到九十岁!

过了不久,我突然接到电话,说是凡一过世了,突发心脏病,抢救也来不及。这天夜里我睡不着,想起了当年如何与凡一从阊门外的万人码头一起踏上苏州的土地,想想他这一生也很可惜,看起来是当了一辈子的官,可也身不由己,他的才能并未得到充分的发挥,到了能发挥时却又笔笔老矣……想到最后却突然想起一件事:我劝他把好酒先喝掉,他不听,如今是“一滴何曾到九泉”。

(原载 陆文夫《深巷里的琵琶声》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年)

关爱下一代成长

保护青少年权益